



# 现代学林点将录

胡文辉 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现代学林点将录 / 胡文辉著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0. 7

ISBN 978-7-218-06807-7


I. ①现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学术思想—思想史—中国—现代

IV. ①B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28134 号

现代学林点将录

胡文辉著

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金炳亮

责任编辑: 柏峰 沈展云

装帧设计: 卢小雅

责任技编: 易志华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真: (020) 83780199

网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经销: 广东省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([www.gdpgfx.com](http://www.gdpgfx.com))

印刷: 恒美印务 (广州) 有限公司

书号: ISBN 978-7-218-06807-7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张: 39 插页: 3 字数: 620 千字

版次: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3000 册

定价: 6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: (020) 89667808

## 序 王来雨

向来只爱写书评，不爱写序。书评是附骥尾，可以旁逸斜出，肆无忌惮；写序是著佛头，必须正襟危坐，敛息屏气。

“正襟”的“正”在中国是一个分量很重的词，尤其当它和文章联系在一起。中国古代的文化人，一辈子奋斗的最高目标，就是死后获得“文正”两字，因为这两个字“极美，无以复加”（司马光语）。获得这个称号的，在三千年历史上，历历可数，远有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韩愈韩文正，近有被毛泽东“独服”的清朝“中兴第一名臣”曾国藩曾文正。

谥号这回事，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，因为中国有一门独到的学问，叫人伦鉴识，兴盛于汉末至六朝的阶段。高级一点叫“品藻”，《世说新语》里记载了很多某人对某人的评语，所谓魏晋风流，相当一部分是互相品藻出来的；低级一点叫相面，就是如今的佛庙道观、旅游胜地门口摆摊的。

谥号的对象是死人，人伦鉴识的对象是活人，但都是庙堂上的事情，参与者都是大官大人。在中国的老百姓和通俗文化中，古有隋唐三十六条好汉和梁山一百单八将，今有百晓生的兵器谱，要分出个高下，排出个具体名次。这并非因为百姓有惊人的数学天赋，也不是百姓有热烈的名次崇拜症，而是因为热闹——即使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物，也会有热情观众呼吁上演“关公战秦琼”的戏码，以增加热闹的程度，热闹而非正经。

热闹需要人多，不然排不出三十六条好汉，只能排出“北洋三杰龙虎狗”。东汉至六朝，是中国文化的一大转型期，五百年间，外来之佛教逐渐侵入本土文化，产生连锁反应，影响遍布于思想、文学、艺术与饮食起居。当时的政治虽然严苛，文化与思想却不执于一端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，风流人物辈出。人伦鉴识之学的昌盛，和这种时代、学术的变化有很大关系。《世说新语》记载的“风流”，就有几位胡僧。

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最新一轮转型期，便是自19世纪中叶开始以迄于今，

目前是否结束还很难预料。在这一百多年里，自帝国而民国而共和国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无论是政治生态，还是思想与学术、文化生态，都奔跑在一条西化之路上，风流人物成堆地出现。中国的学术本身，一向又有宗派的传统，自韩愈韩文正公模仿佛教，提出儒学的“道统说”，门派师承便成为学术传承的主要模式，仿佛武侠小说里的少林武当、五岳剑派。传统的门派师承和“拿来”的各种主义，混杂融合，排列组合，有了先进与后进，有了预流、入流和不入流，也有了先锋和保守等等分野，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的五彩斑斓。

文辉兄的《现代学林点将录》便是对这一斑斓图景的勾勒与点睛。“勾勒”是形，曹衣出水吴带当风；“点睛”是神，顾恺之说过，“四体妍蚩，本无善于妙处，传神写照，正在阿堵之中”。阅读文稿时，我每每为文辉兄的“点睛”之句倾倒。

三年前，为给报纸的副刊增点光彩，我提议文辉兄写这一题目。在我，是好玩；在文辉兄，是一件严肃的事情，他以这题目做了一部学术史。

中国本土的学术史写法，比如黄宗羲的《明儒学案》之类，分门别派，实际上很类似于点将录。自梁启超起，中国的学术史渐向西方靠拢，相形之下，点将录似乎不够严肃，不入学院派之堂。然而这一百多年，恰恰也是点将录这一体裁复兴的时期，前贤有汪辟疆、钱仲联等人的诗坛、词坛点将录，近几年则有王家葵先生的印坛点将录、冯永军先生的诗坛点将录，我也混充其间，写了篇当代新诗的诗坛点将录。如今，文辉兄的《现代学林点将录》出版，浩浩汤汤，令人兴叹，可为点将录的所谓游戏性“正名”。

无论人伦鉴识，还是点将录式的学术史，套用一個俗词，其实都是以人为本。

## 序 冯永军

“点将录”这种品评形式，最初并不是用在文学评论方面的。据《明史·阉党传》记载：“初绍徽在万历朝，素以排击东林为其党所推，故忠贤首用居要地。绍徽仿民间《水浒传》，编东林一百八人为《点将录》献之，令按名黜汰，以是益为忠贤所喜。”可见，最初阉党中人王绍徽所作的《东林点将录》，其实类似于后世的“黑名单”。其用心险恶，自然是不足取的。然而，这个点将录却流传甚广，如大学者阎若璩在《与王山史书》中就讲到自己“儿时读点将录”的事，并且对其中的人物及座次印象极为深刻。可见“点将录”这种品评形式是极为引人注目并深入人心的。

清朝的舒位创造性地利用“点将录”这种形式对乾嘉两朝的诗人进行点评。他的《乾嘉诗坛点将录》，“化宦海党争之具，为词场评鹭之资”（刘寂潮先生语），从此为后人开启了另一种文学批评形式，其影响远较《东林点将录》更为深远。后来如汪辟疆、钱仲联等人，都作有“诗坛点将录”。钱仲联先生更是把“点将录”从诗坛引向词坛，先后著有《近百年诗坛点将录》和《近百年词坛点将录》。近时王家葵先生将“点将”用于艺林，著有《近代印坛点将录》。时至今日，吾友胡文辉先生又把“点将录”引向现代学林，倾数年之力，作成一部《现代学林点将录》，作为“点将录”从党争到诗坛、词坛再到学林中的一环，即使单从范围的扩大来讲，也是有极大的开拓之功的。

王绍徽的《东林点将录》，除了在榜文内的天罡星三十六人、地煞星七十二人之外，还包括“开山元帅托塔天王”，故所点东林党人总数共为一百零九人。而舒位的《乾嘉诗坛点将录》，在体例上除了上述诸位梁山泊头领外，还增加了一名“黄面佛”；另在体例上还有一点不同之处，就是《乾嘉诗坛点将录》增加了“一作”，就是说该头领对应的诗坛人物既可以是某甲，也可以是某乙。这样就使入选的人物大大增加，远不止是一百零九人，

而是一百五十二人了。到了汪辟疆的《光宣诗坛点将录》，在体例方面也有所更新，那就是：第一，舒位的《乾嘉诗坛点将录》中，“一作”只有一人，而汪辟疆的《光宣诗坛点将录》中，“一作”可以有数人之多。第二，汪辟疆的《点将录》增加了“附及”，用来收录那些诗歌未成家数而和某些诗坛大老关系密切的诗人。第三，在舒位《乾嘉诗坛点将录》的那些头领之外，又增加了“教头王进”。不过，后来钱仲联先生的几种“点将录”，则仍依《东林点将录》的旧例，只点了一百零九人。这次胡文辉先生的《现代学林点将录》在体例方面也有了一种新的突破，那就是除了“托塔天王晁盖”和榜文上的一百零八名头领之外，又增加了“额外头领一十九员”。此十九人从何而来？乃是梁山好汉征服河北田虎之时，所得的十九员降将。既然是降将，那么所点之人也必然有所讲究，乃是十九位“域外汉学家”。我最初看到这个体例时，禁不住拍案叫绝，胡先生真可谓别出心裁。

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起，史学大师陈垣在不同场合都表达对汉学中心不在中国的焦虑。比如，1923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在龙树寺举行恳谈会，陈先生曾说：“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，不是说巴黎如何，就是说日本如何，没有提中国的。我们应该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，夺回北京。”其后在1928年燕京大学一年级的课堂上，陈先生又讲到：“今天汉学中心在巴黎，日本人想把它抢到东京，我们要把它夺回北京。”除了陈先生，像胡适等人，也都有过类似的表述。可见，正如胡文辉先生所言：“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，中国学术却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学术。”近代以来，域外汉学家对中国学术展开了广泛的研究，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，其中有些足以令国人望洋兴叹。他们的成果从一开始就为国内学者瞩目，对国内学者而言，既提供了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，同时也是一种刺激和挑战：一方面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成就有难以企及之处，另一方面又自恨这些成就何以不是我们国人所取得的。不过，梁任公当年有句名言说得好：“夫学术者，天下之公器。”现在国人视野开阔，已不是眼中只有中国的时代了；而“天下”云云，当然也不再是太阳照耀之下的中国这一小块地盘，乃是寰宇，是真正的“普天之下”。那么，“中国学术却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学术”了。换个角度看，域外汉学家如此重视中国学术，不也是中国文化的价值和魅力极大的一种反证吗？促狭的人或许

会发笑，这次胡先生也捉弄了域外汉学家一把，“降将”云云，恰恰满足了我们固有的、自高自大的所谓的“民族自尊心”，仍是华夏对待夷狄的态度。不过现在天涯咫尺，四海一家，我们之中的很多人，岂不也是域外文化的“降将”？被胡先生点为“天立星双枪将董平”的钱锺书先生在《谈艺录·序》里曾说：“东海西海，心理攸同；南学北学，道术未裂。”只有具有这种无内无外、一体视之的胸怀和治学态度，才能有助于学术的进一步发展与提高。

胡先生在体例方面的另外一个突破，就是每则“点将”后面的注释。这些注释并不单纯是对正文的注解，更多的时候是问题的进一步引申和拓展。被胡先生点为“地全星鬼脸儿杜兴”的唐德刚，其所著《胡适口述自传》、《胡适杂忆》等书的最大特色便在于不拘一格的注释，用胡文辉先生的话说就是“以杂文笔法为注解，借题发挥，指东打西，可谓文献注释史上的创体”。胡先生写作之时，是不是有意识地参照唐德刚的写法，我不敢确认，不过其注释也和唐德刚一样不拘一格、别开生面却是事实。胡先生的“点将录”最初是在报纸上发表的，限于版面、体例，未能同时刊出注释，大是憾事。此番结集出版，终于可以合成完璧，读者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胡先生的著述旨趣了。

胡先生此作名为《现代学林点将录》，“学林”云云当然不是指一切学问而言，而是有范围界定的。此录所收诸人，大都是文史界人物，而尤以史学界人物为主。胡先生虽然是学中文出身，但据我所知，他涉猎广泛，绝不固步自封限于一隅，多年以来，史学也一直是其用力所在。“点将录”这种形式，貌似游戏文字，其实从舒位到汪辟疆、钱仲联以及后继诸人，写作态度基本上都是极其严肃的，例如，汪辟疆曾多次修订其“点将录”，足以证明作者态度的认真与审慎。胡先生自然也不例外，他是著学术史的态度来作这部《现代学林点将录》的。正如诗坛、词坛点将录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诗话、词话一样，胡先生的《现代学林点将录》自然也是一种学术史。其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，所下功夫之深，眼光之敏锐，丝毫不亚于坊间林林总总的冠以“学术史”的著作；而论及语言灵活、描摹生动，衮衮诸公更是要放胡先生出一头地的。

胡先生早年负笈中山大学，虽然无缘亲炙义宁先生，但是对陈先生提倡

的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早已是心向往之。这部《现代学林点将录》很多地方反映了他不同流俗的见解，不惟名气、不慕权势，对于一些名满天下的学界大老也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不足，这在众多尊奉“妾妇之道”的人眼中可谓身大不及胆甚至胆大包天了。然而惟其如此，才能庶几不负陈先生那两句被学术界炒烂、被很多人阳奉阴违的名言。

克罗齐说：“要了解但丁，我们就必须把自己提升到但丁的水平。”而品评高下这种事更是容易引发争议。相信读胡先生《现代学林点将录》的人中，固然不乏拍案叫绝者，但是像读《光宣诗坛点将录》的陈衍、康有为一样的人物，应该也是有的。比拟之道，视角不同，感观必异，况且很多梁山泊头领在原著中便是面目模糊、甚至无事迹可述者。我早年年少气盛，曾作过一部《当代诗坛点将录》，所以可算是“饮水之鱼”，知道其中的“冷暖”的；而读者中颇有以上述诸事责难者，估计胡先生也难免此诘。然而我相信即便如此，胡先生此作也必不会因之减色。相较于那些不痛不痒、八面玲珑、举之无所举、非之无所非之作，此录必定是不废江河了。数年前初读，我就曾举龚定庵“勇于自信故英绝，胜彼优孟俯仰为”赠之，今日重诵此句，胡先生想来不会以之为厌物的。

庚寅元日序于海上蒹葭馆

## 不敢言序 王家葵

文辉兄的《现代学林点将录》告竣，可喜可贺。

此前戴新伟兄隐约提起作序的事，我虽然觉得是玩笑，依然正色回答：“能够尽快捧读胡先生的大著，快慰无似。以我体会，他已将一部近代学术史烂熟胸中，故点将学林，得心应手。此中的苦甘，只有著者心知。写作中的快感和忽然而生的郁闷，在他的某些章节中都自然流淌出来。即便是玩笑，我也说，这样用心血凝成的书，不是任何外人能够佛头著粪的。”现在我还是坚持这样的看法。

后来，文辉兄果然有信来，详细叙说索序的理由：“我准备请你和王来雨，以及上海冯永军分别作一序。来雨是提议我写此录的人，而且他自己作过新诗的点将录，冯永军则作过当代旧诗坛的点将录。我想你们三位一同作序，既是我对朋友的一个纪念，对点将录此体也是一种盛会。你看如何？”

我虽然固执己见，但毕竟也曾扮演姜太公，攀登过“点将台”，因此乐于将登高所思所见贡献出来，既与文辉兄交流，期博贤者一粲；同时报告给本书的读者，共同体会其中的微言大义，不致因游戏之作而忽略之。

◎“点将录”正榜含“托塔天王晁盖”共一百零九人，而纳入作者视野的人物绝不止此。从数倍于此的名单中，遴选出百余人的“梁山好汉”，作者的学术观点昭然可见。面对这份榜单，读者或许有不同意见，但请相信，每一人物的去取，必经过作者的深思熟虑。极言之，即使将正文全部芟落，仅仅保留这份榜单，仍然可以成立一部袖珍版的“点将录”。

◎人选确定匪易，座次编排尤难。旧头领必是曾领风骚，而在今时代已成为明日黄花的人物；新头领承先启后，需为开创风气，引领群雄的一代宗师。

天罡三十六居地煞七十二之上。同为天罡，宋江、卢俊义、吴用、公孙

胜以外，豹子头林冲、花和尚鲁智深、黑旋风李逵，脍炙人口，排名稍微靠后，但地位不容小觑；地煞之神机军师朱武，虽在《水浒》书中隐而不显，作为地煞领袖，人选也需特别考究。至于鼓上蚤时迁、白日鼠白胜等四人，“诗坛点将录”或付阙如，或用来比附“坏人”，学术考量是否需要涉及具体人物的道德背景，此则见仁见智者。

百数十人逐一比附梁山好汉，某些人物偶然也会因书法、雕铸、医学等“别才”，被取为“圣手书生萧让”、“玉臂匠金大坚”、“神医安道全”，或者因性别而被比拟为“一丈青”、“母夜叉”和“母大虫”，这些确实与“点将录”体例的游戏因素有关，但多数人物之地位升降，则显然隐含有作者对品题对象的褒贬。

◎“点将录”可以简略到仅有名单，稍繁琐则有赞语，再复杂又添加说明文字，如果作者愿意，或者后人多事，更可增列注释——这几部分内容合为一体，各司其职。赞语言简意赅，只言片语确定褒贬，若文网密织，作者的本意往往可以从赞语中推求；说明文字比如判词，论定学术短长，叙述入选理由，数语中的；注释不厌其烦，务使读者相信，此人之入选，确定无疑。

◎舒位的《乾嘉诗坛点将录》问世以来，“点将录”成为一种特殊文体，这种文体固然以游戏的成分居多，但其学术批评性质，并不因此消减。

既然是学术批评著作，所批评的对象又是一个时代“大师级”的人物，按照吾国传统习惯，后生小子居然敢甲乙前贤，实在是不敬之至。至少我作《近代印坛点将录》时，遭遇最严重的指责便是：“你以为你是谁，就设坛点将?!”针对这一意见，我曾作答辩辞说：“影评家与导演各是一行，影评家即使有机会执掌镜头，也未必能超过斯皮尔伯格，但并无害于影评家对斯皮尔伯格们的大作指手画脚。红学家写的小说，可以惨不忍睹，同样也不影响他们喋喋不休地追究曹雪芹的身世，议论《红楼梦》的结构。”

与我作为“行外人”来讨论书法篆刻不同，文辉兄已出版的《陈寅恪诗笺释》，足以证明他的“学人”身份，因此，即使屈从于前面提到的“吾国传统习惯”，由他来点定学林英雄谱，也无愧怍。

2009年11月22日

## 例 言

一、正如人类的历史并不等于英雄史与伟人史，学术史亦不等于杰出学人史；但作为文化英雄的学人，仍可谓学术史的关节，从人物切入，不失为总结学术史的方便法门。古典体裁的学术史，如正史的《儒林传》，如《宋元学案》、《明儒学案》，如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，无不以人为纲。故以“点将录”的形式评点学术人物，并非纯属文字游戏，也是具体而微的学术论衡。选择何种人物，即呈现何种学术观，人名录亦是一种学术史。

二、作为著述形式，“点将录”只是对单个学人分别作印象式的批评，看似轻松，但比之一般流水账式的学术史编纂，其实远为困难；因为这一工作最需要学术通识的贯注，不熟知百家，则不足以论一家。以诗学为例：近人汪辟疆《光宣诗坛点将录》、钱仲联《近百年诗坛点将录》，无论是撰写难度还是学术价值，就远非一般的诗歌史所能及。

三、近时有所谓“国学大师”的评选秀，虽不免鲁莽灭裂，但也是触发撰写“点将录”的动机之一。而此录的性质，则不以“国学”为本位，而是以“学术”为本位；不以“大师”为号召，而是以“学人”为号召。在评估学人成绩上，偏向现代标准：重创新甚于重功力；重专精甚于重广博；重西方现代学术训练及背景，不重中国传统本位的学术取向；重实证主义的踏实工作，不重形而上学的古典思辨。能引入新方法、开拓新领域者，有独特个性、有自家面目者，作出基础性、专题性的史料功夫者，皆拔高一等；而学力深、著作多而风格不彰者，如陈柱、俞平伯、高亨、姜亮夫、吴世昌、张舜徽、程千帆等，则宁可舍弃在外。

四、民国以来的中国学术，一方面趋新求变，方法多取径西方；但另一

方面，由于本土学术传统及学术资源的潜在制约，在研究领域上，仍不能不以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为重心。故这一时期最具水准与成绩的学问，始终以中国领域为绝对主流；而在中国领域之内，又始终以广义的史学为绝对主流。易言之，是以“文史之学”，也即所谓“国学”最为发达。相比之下，专攻“西学”者，若不能将外域理论与本土史料融会贯通，则仅能处于仰人鼻息的转介地位，终难有原始的、系统的理论创见。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、“中学为本，西学为末”、“中学为主，西学为辅”等语，倒可借以形容近百年中国人文学术的大势。故“点将录”的选择标准，亦侧重于“中学”本位的文史学人，而不照顾学科分布的均衡。

五、李泽厚形容近十数年学风，有“思想家淡出，学问家突显”之语；其实此语更可以概括清代以降近四百年的学术风尚。入民国以来，内有清代考据学的遗传，外有西方实证主义的支援，里应外合，推波助澜，以胡适和史语所为代表的“新考据学”，遂成为这一时代的学术主流。故此时期有重要贡献的知识人，其研究工作多以史料考辨和整理为基础，以历史与文化的发现与阐释为取向。几乎可以说，这个时代只有“考据家”，没有“理论家”；只有“学问家”，没有“思想家”。与此相对，传统的义理之学虽存一脉，却未能跳出古典观念体系的掌心，与现代学术规范接轨。以熊十力为例，其“思想家”的气魄有余，而陷于“格义”式的比附、“六经注我”式的创说，在“学术”立场而言为不能实事求是，在“思想”立场而言又不能自出机杼。故“点将录”将熊十力一类的玄学家排斥在外。

六、民国以来学者如林，同一级别的名家众多，见仁见智，取舍为难，不偏不倚，谈何容易。事实上，所谓“文无第一”，论人尤难于论事；盖考辨事实，尚可能接近客观，而品评人物，势难避免主观。此外，为切合各人的身份、特征，甚至为求增加娱乐性，此录在排行上也不尽拘泥，座次前后，未必代表学问高下。

七、在体例上，“点将录”以人为纲，每则首先评论具体人物的学术成绩、取向及方法，以见其学术史地位；再述其轶事逸闻，以知人论世，并增

风趣；最后附以绝句一首，不拘一格，以留余味。故此录一方面继承舒位《乾嘉诗坛点将录》、汪辟疆《光宣诗坛点将录》、钱仲联《近百年诗坛点将录》的形式，另一方面又糅合叶昌炽《藏书纪事诗》、刘成禺《洪宪纪事诗》的体裁，实为“点将录”与“纪事诗”的结合。

八、“点将录”的通行格式，是正榜头领一百零八员，另冠以旧头领一员，故此录共选入民国以来的中国学人一百零九位。但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，中国学术却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学术；论现代学术史，已无法自限于禹域之内，而回避国际汉学的成就。故别出心裁，突破体例，另选择有重要成绩，且于中国学界有重大影响的域外汉学家附录于后。据《水浒传》第一百零五回，梁山好汉征服河北田虎，得降将计十九员，故以此为据，配以汉学家共十九位。

现代学林点将录

旧头领一员



## 托塔天王晁盖 章太炎



章太炎（1869—1936），原名炳麟，字枚叔，号太炎；浙江余杭人。

论清末民初的思想学术，可举三对师徒为代表：康有为、梁启超，章太炎、黄侃，罗振玉、王国维。罗、王关系在师友之间，但王氏的出人头地实赖罗氏的全力提携，故不妨亦以师徒视之。

三对组合，在政治和思想学术两方面立场各异，恰成有意味的对照：康、梁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都属改良派，一方面倾向保皇立宪，反对革命；一方面以言论为“批判的武器”，开启风气，转移人心，启蒙之功莫大焉。章、黄在政治上是激进派，鼓吹排满革命；在学术上却是保守派，以保存国粹为号召，排斥新材料、新方法，为清代小学（语言文字学）的殿军。与章、黄相反，罗、王在政治上是保守派，死心塌地做清朝的孤臣孽子，身在民国，心怀复辟；但在学术上却是革新派，以出土文献的发现及整理为志业，尤以甲骨学的开创惊世绝伦，世称“罗王之学”。章、黄跟康、梁相比，在政治上未免冒进，而跟罗、王相比，在学术上又嫌滞后，两皆失措。他们虽能在古音学方面后出转精，却自限于清代小学的旧樊篱，不能转入现代语言学的新天地。<sup>[1]</sup>